

## 清代官方视野下的灾民群体及其救济策略

杨双利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清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民族、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多元性催生出的姻亲关系、族群认同、经济权利、阶层分异、文化区隔、地缘政治、灾荒境况等诸多因素对清代官方的灾民认定和救济策略产生了不同影响,使得不同群体中“灾民”的救济待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为了实现“毋任一夫失所”的“养民”宏愿,清廷继承前代政治传统,结合本朝政权特点,在优先旗人的前提下,对农户、士人、军户等社会主流阶层给予了充分救济,同时也对边疆民族地区及其他不同身份的灾民群体、不同境况的灾荒地亩进行了特别处理。为了确定符合官方认同的真正“灾民”,清廷严格采用了多种因素交互确认的方式。在救荒实践中,清廷灵活调整救济策略,使身份各异、境遇不同的各类灾民大都有了规则明确而形式多元的获救路径,这对清朝“大一统”国家政权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清代;灾民;官方视野;救济策略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5-0131-13

## The Victims and the Relief Policy in the View of Authorities in Qing Dynasty

YANG Shuang-li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Abstract:** Many factors like affinity, ethnic identity, economic rights, hierarchy, cultural difference, geographic politics, and natural disaster brought out by the diversity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military, society, nationality and geographic environ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had different influence on the refugee identity and relief strategies of Qing authority. It makes the relief of victims tend to b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ased on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previous governance and the regime features of the reign of the day, the authorities provided sufficient relief for the mainstream classes like farmers, scholars, soldiers and nobilities, and handled the victims in border areas, the other victims of different identities as well as lands suffering from different degrees of disasters in special means in order to give everyone the benefit.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victims met the standards of the "real victim", the authorities made confirmation in an interactive way by considering diverse factors. In the practice of relief, the authorities adjusted the relief strategies flexibly, providing the majority of refugees who owned different identities and suffered from different conditions with clear rules and diversified approaches to get rescued, which also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unification of Qing's national regime.

**Key words:** Qing dynasty; victims; the view of authorities; the relief policy

**【收稿日期】** 2021-05-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仓与清代乡村治理研究”(19CZS033);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清代仓储建设与粮食安全研究”(2019030157)

**【作者简介】** 杨双利(1987-),男,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清代社会经济史、灾荒史。

满清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两百余年,其崛起的历史中就形成了以满人为核心的族群认同和以八旗为基础的政治认同。入主中原以后,这两种认同都成为清朝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满人汉化历程中,传统中国“四民”社会的诸多元素也逐渐渗入,从而形成满汉杂糅、新旧融合、多元认同的“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并充分展现在清代国家的救荒实践中,尤其表现在对不同灾民群体的身份确认和救济策略上。清代救荒史研究成果丰硕,但关于灾民群体的专题研究屈指可数。袁昌曲分析了明清官方赈济生员的原因,认为:除了灾荒因素外,生员的社会地位、经济基础、社会流动等也是其中致因<sup>①</sup>。张建民通过对清代生员赈济具体举措的分析,揭示了赈济背后的文化元素和制度原因<sup>②</sup>。王洪兵、张松梅讨论了清代京师粥厂的类型及其救助贫民的作用<sup>③</sup>。张祥稳指出,乾隆朝政府将自耕农、佃农、屯丁、灶户和各直省下等旗人视为灾赈对象的主体,政策宽大,显示了高宗皇帝“藏富于民”的思想;对贫生、绿旗兵丁和无业贫民等其他群体未能适度统筹兼顾,一定程度上酿成了许多社会问题<sup>④</sup>。除以上外,大多数灾荒史研究的成果都以“灾民”这一缺乏区分度的群体形象笼统描述受灾的人群。而张祥稳关于灾赈对象的研究也只限于乾隆朝,涉及的灾民群体有限。因此,关于清朝政府对不同身份和不同境遇“灾民”的认定规则和救济策略仍然缺乏一个总体认识。

## 一、旗人及其附属人群

满清政权自部族而起,结族而群,形成了庞大的满人群体。旗人作为“满洲特性”的核心代表,一直被视为爱新觉罗政权创业和守成中既“亲”且“贵”的坚实拥护者。他们不仅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还是清朝军政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在政治待遇和社会福利方面享有比其他人群更为优先的权利,灾荒救济方面也不例外。

清朝初年,由于战乱和饥荒的交相侵袭,陷入生存危机的人群不一而足,有遭遇自然灾害之灾民、新归版图之穷民、因战乱而丧失亲人和生计来源之孤贫,亦有因各种原因涌入京城之流民、饥民,更有因王朝更迭而生计维艰之贫士<sup>⑤</sup>。然满清初入中原,社会经济尚待复苏,政权版图亟须拓展,灾荒救济的能力和范围都十分有限。文献记载表明,八旗是清初灾荒救济的主要受众,尤其以京畿地区旗人地亩水旱灾害的救济最为频繁<sup>⑥</sup>。救荒制度建设方面,最先得到关注的也是八旗。顺治二年(1645),“定赈恤八旗例”,规定满洲八旗以及王、贝勒、贝子、公等府属人役“涝地每六亩给米二石”;口外八旗蒙古“按口给银,听其沿边采米”,不准入口买米;八旗游牧地灾民“每口月给米一斗,在张家口者给米,在古北口者给银”;“带地投充人役”不在赈济之列<sup>⑦</sup>。顺治六年(1649)规定,旗人如遇水旱灾害,“王以下及食俸官每岁照俸米倍给”<sup>⑧</sup>。顺治十年(1653)关于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的赈济规定表明,旗人内部在赈济物资配给方面也有级差。该年灾荒赈济中,以牛录为单位,“满洲、蒙古每佐领下给布六十匹、棉六百斤、米一百石”,“汉军每佐领下给米、布、棉半之”<sup>⑨</sup>。同时,划分了不同年龄段旗人赈济的核算标准,按照统查口

① 袁昌曲:《明清时期生员赈济原因之探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② 张建民:《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③ 王洪兵、张松梅:《清代京师的粥厂与贫民救助》,《东岳论丛》2013年第5期。

④ 张祥稳、刘亚中:《乾隆朝灾赈对象之条规考辨》,《中国农史》2012年第4期。

⑤ 《清世祖实录》卷33,顺治四年八月癸巳;卷77,顺治十年七月乙巳。《清朝通典》卷17,食货17,典2122。

⑥ 《清朝通典》卷17,食货17,典2122;《清朝通志》卷86,食货略6,蠲赈上,志7255。

⑦ 《清朝通典》卷17,食货17,典2122;《清朝通志》卷86,食货略6,蠲赈上,志7255。

⑧ 《清朝通典》卷17,食货17,典2122。

⑨ 《清朝通志》卷86,食货略6,蠲赈上,志7255。

数,“七岁以上为一口,六岁以下、四岁以上为半口”,明确强调“不得以投充及雇佣人充数”<sup>①</sup>。顺治十一年(1654),清廷规定对旗人涝地“给满洲、蒙古每佐领下二百石,汉军每佐领下一百石;旱地每六亩给二斛,本折各半”<sup>②</sup>。同年,将守护南苑的海户亦纳入了赈济范围,不论旱涝,灾地“每六亩给米一斛”<sup>③</sup>。海户中有一部分正是此前规定不准列入赈济范围的“投充人役”<sup>④</sup>。顺治十三年(1656),将八旗中的贫户兵丁与官员、富族家人充丁区分开来,贫户兵丁由各旗佐领、领催亲验给发,官员、富族家人充兵者不准给赈<sup>⑤</sup>。顺治十六年(1659),再次确认了此前出台的大口、小口年龄段划分规则,强调了“投充及雇佣人”不准给赈的原则<sup>⑥</sup>。康熙七年(1668),将八旗报灾时限定为“不得逾八日、十日”<sup>⑦</sup>,关于旗人灾荒救济的相关制度和规则基本建立起来。

东北作为龙兴之地和旗人聚居区,灾荒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表1所见汪志伊《荒政辑要》中关于盛京地区灾荒赈期的记录表明,东北灾荒救济与关内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不止存在于盛京,吉林地区嘉庆十五年(1810)、道光二十六年(1846)、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二年(1863)数次水灾都是按照这种差异化赈济开展的救荒活动。这些救荒事例中,不同身份灾民的口粮标准也存在差异:八旗官兵、官庄壮丁、站丁“大口每月给仓米二斗五升、小口减半”,其他丁民“大口每日给仓米五合、小口减半”<sup>⑧</sup>。嘉庆十九年(1814)及道光八(1828)、九(1829)、十二(1832)、十四(1834)、二十一(1841)等年奉天水旱灾荒应对过程中反复声明,只对“实在本身承种被灾地亩户口”进行赈济,其在州县任官及家中另有田禾收获可以抵补灾歉者与“一人承领地亩,其弟兄子侄并不承业与招佃取租者”“毋庸议赈”<sup>⑨</sup>。关外皇庄遇有灾荒时,先由庄头地租及存仓粮食拨发赈济;皇庄仓粮不敷赈济时,在庄头折交盛京户部银粮内动用;再有不敷,则从内务府库存房租、生息等银动拨<sup>⑩</sup>。

①《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218,户部91,页1。

②《清朝通志》卷86,食货略6,蠲赈上,志7255。

③《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218,户部91,页2。

④“海户”是明清时期在南苑负责维护苑墙、饲养禽兽、种植瓜果蔬菜等事务的民户、太监以及清初圈占土地和投充法背景下的投充人役。在经济上享有一定的赋税优免权,在社会地位上属于贱民阶层。南苑因地处古永定河流域,是易于发生水灾的地方。乾隆二十七年(1762)水灾给海户造成很大损失。乾隆帝作《海户谣》曰,“海户给以田,俾守南海子。常年足糊口,去岁胥被水。以其有恒产,不与齐民比。赈贷所弗及,是实向隅已。我偶试春搜,扫除仍役使。蓝缕洵可怜,内帑宁惜此?一千六百人,二千白金与。稍以救燃眉,庶免沟中徙。并得贯春种,青黄藉有待。道旁纷谢恩,菜色颇生喜。尔喜我所惭,过不他人诿”。参见《丰台风情咏》编委会编著:《丰台风情咏》(古代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230页;黄阿明:《特殊的贱民——明代海户浅探》,《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2期;黄续宏:《明清海户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⑤《清朝通志》卷86,食货略6,蠲赈上,志725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271,户部:蠲恤,赈饥1。

⑥《清朝通典》卷17,食货17,典2122。

⑦《清朝通典》卷17,食货17,典2122。

⑧《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5册,第388页;第51册,第304页。《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1册,第588-590页;第13册,第639-642页。

⑨《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9册,第730页;第33册,第303页;第34册,第430页;第37册,第585页;第39册,第338-339页;第46册,第288页。

⑩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初十日盛京将军社图肯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164-024;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盛京将军社图肯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164-026;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署理盛京将军额尔德蒙额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165-012。本处及以下所引朱批奏折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不再重复说明。

表 1

盛京旗地、官庄及站丁灾赈分数与期限<sup>①</sup>

类型	十分	九分	八分	七分	六分	五分
旗地	5个月	5个月	4个月	4个月	3个月	3个月
官庄地	5个月	5个月	5个月	4个月	4个月	3个月
站丁	9个月	9个月	9个月	9个月	6个月	6个月

乾隆末年,政府允准关内灾民前往关外就食,无田无业贫民到关外定居垦种者日益增多,以至于出现关内灾民与关外旗人争食、争地的情形。嘉庆初年,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影响了旗人生计。嘉庆八年(1803)重申民人出关后不准私垦、私典旗人地亩的禁令<sup>②</sup>。道光二年(1822)、三年(1823)两年直隶灾荒中,又有大批贫民携眷出口觅食,而且越积越多。道光八年(1828),清廷再次严明关禁,令守关各员“谨遵定例,查验持有执照者始准放行”,又通飭各该州县官员晓谕民人“不可轻去其乡”。同时,实施了严密的监控措施,“凡携带妻子、迁移家属出口,概不得妄行给照”,并对私自偷越出关者进行严惩<sup>③</sup>。道光十五年(1835),为了遏止山东贫民出关,清廷再次晓谕地方官在灾歉之后“务当随时体察,设法抚恤,毋令各处贫民附搭便舟、乘用小舟,借称依亲就族,挈眷同行,以致陪都重地流民杂处”。另外,对从事经常性贸易的客民也进行了限制,“不得概任轻去其乡”<sup>④</sup>。显然,关外流民增加与关内灾荒严重及救荒不力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清廷希望通过督促官员尽力救灾,尽可能地减少关内灾民向关外的流徙,以达到保护陪都重地旗人生计的目的。

以上所见,清朝政府关于八旗及其附属人群的救荒规定中表露出较为明显的种族认同、政治认同,也有细致的经济评估规则。在种族认同上,满洲、蒙古八旗灾荒赈济比汉军八旗更为优越。在政治认同上,王公亲贵各府属人役享有与八旗兵丁同等的赈济,而那些带地投充的人役及雇佣人等则不准纳入赈济的范围。打理南苑的海户由于其服务皇室的特殊角色,虽然在政治身份上属于贱民阶层,亦包含了投充人役,但仍然被纳入灾荒救济的范围。在经济层面,清廷明确区分出那些需要救济的贫困八旗兵丁及其家户,而将官员、富族出身的兵丁置于救济范围之外。东北的灾荒救济中,八旗官兵、官庄壮丁、站丁在口粮标准上与普通丁民区分开来,将实际耕种灾田的灾民与有能力自救的官民及佃主区别开来;皇庄受灾则以庄头自救为先,不得已再向对应的上级部门求赈。为了保护旗人生计,清廷还屡次申明关禁。

## 二、贫民与佃户

尽管八旗是清初灾赈的主要受众,但全国性的灾荒救济问题至迟在顺治八年(1651)也被提上清廷的议事日程。该年,清廷将查勘灾荒“顷亩分数”定为直省督抚的一项重要任务。顺治九年(1652)规定,“京城由户部、直省由督抚请赈”<sup>⑤</sup>。农作物歉收分数作为查报灾情、分等定赈的主要依据,农业人口随之成为清代国家荒政的主要受众。有地农户由于政府查勘他们土地上作物的歉收分数而获得相应救济,无地贫民却因难以向政府提供其遭遇灾害的凭证而常常被排除在灾荒赈济的范围之外。因此,清代前期救荒活动中所谓乡村“贫民”通常是有地农户,无地、无业贫民,除鳏寡孤独者被给予特殊养赡外,大多被长期忽略。

① [清]汪志伊辑:《荒政辑要》,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2辑第2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89-590页。

②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8册,第142-143页。

③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3册,第347页。

④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0册,第499页。

⑤ 《清朝通典》卷17,食货17,典2122。

直到乾隆初期,农村无地、无业贫民灾荒救济问题才得以被充分关注。乾隆二年(1737)陕西救灾活动中,对成灾村庄中不在蠲免、借贷之列的无业贫民给予赈济<sup>①</sup>。乾隆三年(1738)直隶水灾,乾隆帝指出,“目今现在查赈,闻有司奉行不善,所查者多系有地之家,而无业穷民转至嗷嗷待哺”,令直隶总督李卫敦促地方官将无业穷民一体赈济<sup>②</sup>。乾隆五年(1740),御史张重光奏称,“小民无田者多,若不一体加赈,势必转徙异地,应飭地方官,凡遇岁歉,州县散赈,务必通查合属贫民,均行赈济,不可过为区别,稍有遗漏”。户部覆议,“此等贫民,或佣工度日,或手艺营生,一遇灾歉,无处谋食,实与有田被灾者相等”。但因没有灾田分数作为确立赈额的依据,户部只给了一个大致意见,“查照实在艰窘情形”“妥酌办理”<sup>③</sup>。因此,后来关于无地、无业贫民的赈济也都被视为非常之例。乾隆九年(1744)直隶旱灾、乾隆十七年(1752)江西灾荒中对农村无业穷民给予借贷、赈济也都被视为“不拘常例”之举<sup>④</sup>。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廷意识到灾荒时期从各地流散到京师的贫民中有一些是在本籍无田、无业者,即使资遣回籍,亦复流往他处,遂下令对流往城市的贫民增加赈期<sup>⑤</sup>。嘉庆以后,清廷对无地、无业贫民的救济越发关注,通常采取赈给或借贷口粮的办法。<sup>⑥</sup>一些地方格于无产贫民“不准承借仓谷”的定例,即通过减价平糶的方式变通应对<sup>⑦</sup>。另一些灾荒赈济中,针对有地无力穷民、无力佃农及无地、无业贫民区分出更为细致的差异化救济办法,前二者通常借给籽种或口粮,偶尔会无偿赏给,后者往往只赏给口粮<sup>⑧</sup>。

除了乡村贫民外,城镇居民也经常因灾荒而陷入危机,他们的行为比乡村贫民更为激烈。乾隆七年(1742)江南水灾中,由于“在城居民有力之家例不在赈恤之列”,许多城镇居民为“勒要散赈”而聚众罢市、哄闹公堂<sup>⑨</sup>。乾隆二十年(1755)江苏水灾中,亦因城镇贫民有“例不给赈”规定,地方官组织商捐煮赈接济了觅食维艰者<sup>⑩</sup>。乾隆五十七年(1792)直隶旱灾中,乾隆帝充分相信,聚集京师的无业贫民多系无从得食者,如有手艺或能力佣工自谋生计者必不至聚众邀恩。因此,当官员忧虑“贫民赴京日多,惧干咎戾”,欲“令地方官先行拦阻”的时候,乾隆帝表示非其“痼瘵在抱之意”,下令在各处尽量多开设粥厂,并准许贫民赴口外丰收之地谋食,以致于京城及热河等处煮赈每日不下数万人<sup>⑪</sup>。嘉庆六年(1801)直隶水灾中,查赈大员熊枚经过河间府交河县时,发现泊头、三铺等一些地方老幼男妇纷纷求赈,也是因为该处“系市镇之地,例不给赈,是以该县未经造入赈册”,只因本年水灾严重,求赈饥民众多,熊枚才奏请不拘成例发给一月赈粮<sup>⑫</sup>。嘉庆十九年(1814),江南地区“绅民因官赈灾农,城厢向不得预,捐银十七万两零分别散给,余银二万九百余两亦经奏明交商生息,永作城内备荒之用”<sup>⑬</sup>。以上诸多事例均已表明,城市贫民不在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规范里,往往依靠地方政府和绅衿商富通过煮赈的方式临时接济。

① 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川陕总督查郎阿折,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105-016。

② 《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307页。

③ [清]佚名辑:《赈案示稿(节选)》,《中国荒政书集成》第4册,第2230页。

④ 《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230、600页。

⑤ 《乾隆朝上谕档》第4册,第109-110页。

⑥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册,第5-6、487页;第17册,第24页;第18册,第150-151、162、412页。

⑦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6册,第143页。

⑧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2册,第5页;第13册,第2-3页;第17册,第107-108页;第20册,第1-3页;第22册,第35页;第25册,第241页;第26册,第4页;第31册,第160-161页;第31册,第169页;第52册,第6-7页;第54册,第3-4页。

⑨ 《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801页。

⑩ 《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768、813页。

⑪ 《乾隆朝上谕档》第16册,第910-911页;第18册,第119页。

⑫ 《钦定辛酉工赈纪事》卷27,《中国荒政书集成》第4册,第2437页。

⑬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5册,第134页。

租佃制是传统中国地主制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通常而言,佃户所种之地系地主所有,收成却因租佃关系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若佃户与地主约定缴纳定额租,则灾荒造成的损失全部要由佃户来承担;若约定分成交租,则地主要承担一部分灾歉损失。实际勘灾过程中也会考虑佃户佃种土地的数量及佃种与自有土地被灾程度的差异。虽然清代官方文献中详细记录佃户赈济的内容不多,但从一些荒政书中也能一窥佃户赈济的细部差异。万维翰著《荒政琐言》中描述了浙江佃户灾赈等级的划分:

浙省向来查赈规条,以被灾穷民并无己田,又无手艺营生、山场别业,向系佃种为活,及佃田十五亩以下、己田十亩以下全被灾伤,准作极贫;又己田十五亩以上,佃田十五亩以上,被灾过半,又无山场别业,准作次贫;佃田十五亩以上之户,虽无己田,如果全灾,亦列作极贫。被灾之民并无己田己屋、佃田耕种全荒者,或无己田己屋、佃田成灾过半、家口众多者,并外乡迁居耕种田已全荒、无力佣工者,定为极贫;虽无己田、尚有房屋牲畜、佃田全荒者,虽无己田己屋、佃田半属有收而家口无多者,自种己业仅止数亩全荒者,或有少许收获而家口众多者,搭寮居住耕种外乡别邑农民佃田荒已过半、无力佣工者,定为次贫。此虽已行成案,亦只言其大概耳。总在临时酌看情形,因地制宜,妥协办理,毋致遗滥,不可过于拘泥也<sup>①</sup>。

方观承《赈纪》的记载则表明,在旗人作为田主的灾荒赈济中,“正身种地”者与佃种旗人地亩的佃户是区别对待的,后者被登记在“民册”之内查办<sup>②</sup>。姚碧《荒政辑要》中指出,租佃制较发达的江浙地区佃田成灾时,州县通常“将钱粮蠲与业主,赈恤给与佃户”<sup>③</sup>。他对佃田勘报灾荒的具体办法作了详细记录:查灾人员先携带鱼鳞图册查勘被灾地亩,“查得某庄某甲某户某圩某号田若干亩,或系佃种,则注明佃户某人、住居村庄、种植何项、被灾似有几分,随即登簿”;而后携带烟户册按照前法比对顷亩分数与户人,“查得某庄某甲某户大小丁口若干,似属极次贫,自种田若干,或佃种某人田若干,内被灾几分,田若干,随即登记”<sup>④</sup>。散赈之“籽本谷石,系自种者,给与业户;佃种者,应赈给佃户”<sup>⑤</sup>。一些荒政书中注意到分成租与定额租的不同,认为“收成之际,有分收籽种者,有定额收租者,其例不一”,查赈时需要仔细甄别<sup>⑥</sup>。由于佃户与业主在佃田收益分配上直接相关,清廷很希望田主能够承担一些养赡佃户的责任,并多次颁文劝谕田主在灾荒时期减让田租以周恤佃户<sup>⑦</sup>。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提出,以有无田主养赡为由,对遭灾佃户进行区别对待:

业户之田,类多佃户代种。内如本系奴仆雇工,原有田主养赡者,毋庸给赈。如系专靠租田为活之贫佃,田既遇荒,业主又无养赡,并查明极次,及所种某某业主之田,按其现住灾地分数给赈,不得分投冒领。<sup>⑧</sup>

然而,让田主养赡佃户似乎不容易做到,而佃户抗租闹赈的行为也屡有发生。道光二十一年(1841)浙江绍兴、嘉兴等地秋灾,佃户抗租闹赈。清廷恐事态扩大,令地方官“宽严并用”,妥善处理<sup>⑨</sup>。道光二十八

① [清]万维翰:《荒政琐言》,《中国荒政书集成》第3册,第1903页。

② [清]方观承:《赈纪》,《中国荒政书集成》第3册,第1925页。

③ [清]姚碧辑:《荒政辑要》,《中国荒政书集成》第4册,第2078-2079页。

④ [清]姚碧辑:《荒政辑要》,《中国荒政书集成》第4册,第2062-2063页。

⑤ [清]姚碧辑:《荒政辑要》,《中国荒政书集成》第4册,第2066-2067页。

⑥ [清]佚名辑:《赈案示稿(节选)》,《中国荒政书集成》第4册,第2229页。

⑦ 《劝谕业主恤佃示》、《飭谕被灾旗地业佃相安谕》,载[清]方观承:《赈纪》,《中国荒政书集成》第3册,第1981页;《劝谕业主恤佃示》,载[清]吴元炜:《赈略》,《中国荒政书集成》第4册,第2044页。

⑧ [清]汪志伊:《荒政辑要》,《中国荒政书集成》第4册,第2522页。

⑨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6册,第394-395页。

年(1848)直隶水灾之后,将被灾佃民“归人民户一体赈济”<sup>①</sup>。

### 三、贫士

“士”为四民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精神境界的标杆。作为个人的“士”也并不能超脱对物质和情感层面的需求。在精神力量的支撑下,许多甘愿清贫的士人即便能够安度日常,却也熬不过灾荒的侵袭。因此,当灾荒到来时,“士”的群体形象往往会被其中的一些个体行为所冲击,以至于在朝堂之上引发了关于士人生计问题的讨论。生员作为底层士人,在文化形象、伦理境界及生存能力方面都不足以与一般士人乃至上层士人相提并论。他们在灾荒时期的表现往往更为多样。为了解决灾荒引发的生员生计危机和文化形象之间的矛盾,清代以前的国家政权就有置学田、征学租、养贫士的政策<sup>②</sup>。清初,满清政权效仿前朝,为生员划拨出可以收租供其膳食的学田。灾荒之时,亦有给予一定赈济者。康熙年间,张能麟撰写的《救荒政略》中提出“赈贫士以广教养”的主张:

士为四民之首,况平日束身诗书,资生无策,值此凶荒,贫窶必甚。今欲令其随行逐队,蒙袂而受嗟来之食,非惟不愿,亦属不堪。应令州县分别查造清册,其极贫者,每名按月给谷若干斗,资其饘粥。是亦圣朝爱士之一端也。<sup>③</sup>

在张能麟看来,让士人与其他灾民一起同厂受赈,不仅会引发士人的心理排斥,也会损害其文化形象。然而,清朝初期并没有在学田、学租之外为士人开辟另类的救荒途径<sup>④</sup>。乾隆元年(1736),考虑到地方学田学租数额有限,灾歉之年贫生无以为继,遂将“不在齐民赈恤之列”的“赤贫无食”之贡监生员亦纳入赈济,令教官造册之后“转送地方官,按其家口,量加抚恤”<sup>⑤</sup>。乾隆三年(1738)规定,遭灾生员由地方官自“存公项内量拨银米”交给教官放赈,以便与齐民赈济区分开来,各省学租亦可酌量散给<sup>⑥</sup>。从此之后,地方贫生的赈济不再只依靠学田学租,在地方公费中亦有一份物质保障。

政府将生员纳入灾荒赈济之列,不仅是出于对其生计的关切,亦在防止生员恃有生监身份而干预地方事务,更是为了维护士人作为文化承载者和伦理标杆的形象。因此,清廷在颁布赈济贫生谕令时即强调,“若生员等不知感激自爱,因此而干预地方,恃有生监护符,以致肆行种种不法之事,该督抚等仍应照例查察,毋使陷于罪戾”<sup>⑦</sup>。方观承在《赈纪》中则指出,贫乏生员只令教官“酌量周恤”,而“不言赈者,所以别于齐民”,“以养其廉耻”。为此,对救荒活动中“贫生混入灾民滋事者,轻则发学戒饬,重则革究”<sup>⑧</sup>。乾隆七年(1742)江南水灾中,地方生员与绅衿大族中的一些人士聚众罢市、哄闹公堂,索要散赈。乾隆帝不仅下令将为首的生员、绅衿查拿治罪,并处罚了学政、教官,“以为董率不严之戒”<sup>⑨</sup>。乾隆十四年(1749)甘肃灾荒放赈过程中,张掖县西海渠民前往抚彝堡领赈,造成两地灾民互相争食。抚彝堡灾民以

①《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3册,第323-326页。

②[清]祁彪佳:《救荒全书》,《中国荒政书集成》第2册,第857页。

③[清]张能麟:《救荒政略》,《中国荒政书集成》第2册,第1053页。

④张建民:《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50页。

⑤[清]杨景仁:《筹济编》,《中国荒政全书》第2辑第4卷,第111页。

⑥《清高宗实录》卷67,乾隆三年四月甲辰。

⑦《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270页。

⑧[清]方观承:《赈纪》,《中国荒政书集成》第3册,第1925页。

⑨《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801页。

生员赵瑗、闫琅为首争闹于仓口,亦被严厉查拿,从重治罪<sup>①</sup>。

然而,生员滋事、闹赈等行为很多时候与地方政府对待灾荒的态度有关。乾隆四十三年(1778),山东东阿县上年歉收、本年无麦苗,异常荒旱。知县不仅不报灾荒,还在应交漕米的基础上“绅衿加倍,百姓加三”,以致于家有二顷地,本应交漕米不足2担的东阿监生曲九苞家需要交4担才能完成任务。曲九苞以到京城讨个工程差事为由,将地方官贪腐之事告到了京师。乾隆帝只好派侍郎喀宁阿等前往查办<sup>②</sup>。还有一些地方学政奏请将“向备赈济贫生”之用的学租拨给书院作为膏火之用。清廷的态度则模棱两可,“所请可行即奏明,准其拨给;若有窒碍之处,亦即据实具奏,不可稍涉迁就”<sup>③</sup>。这种情况往往导致济贫之资转用于奖赏,贫生需要接济时却无从动拨。

“揭帖”是传统社会具有文字书写优势的生员常用的一种控告地方事务的手段,但却为政府所忌惮。嘉庆六年(1801)辛酉水灾中,前往直隶灾区查赈的熊枚在文安县内“揭得匿名揭帖”,“其歌词内有城内寒士不沾颗粒之语”。清廷断定此“系该处城内生监妄为编造”,并指出“此等匿名揭帖大干例禁”,“灾黎固当赈恤,而刁风亦断不可长”,令署理直督陈大文严行缉查,“一经拿获,仍照定例办理,示惩”<sup>④</sup>。嘉庆帝严肃申明,“生监等例不给赈,原以身列胶庠,不等齐民之列”,其中生活艰窘者,“教官照灾案定例拨给银两,以供饘粥”。总之,“民间疾苦必当实心抚辑,而士习浇漓亦须加之整饬”。嘉庆帝的态度很明确,不仅要严惩“两次编造匿名揭帖之人”,更要宣谕百姓,使其“咸知感朝廷赈恤之恩,尊敬长吏,方为妥善”<sup>⑤</sup>。他给熊枚的批示中指出,查赈过程中对浮开冒销弊端要查办,对地方健讼、闹赈之生员“亦不可有惩而无劝”<sup>⑥</sup>。

古人以“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表达生存基础与伦理境界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士人在面临生存危机时,这种关系的不协调性体现得格外明显。不仅表现在士人自身的生存危机与伦理精神之间的矛盾,亦使国家政权不得不直接插手解决士人文化形象与个人行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主要做法是,在区别士人与齐民身份及甄别“真”贫士与“伪”贫士的前提下,给实在贫士以必要的赈济。

#### 四、兵丁及其家属

关于旗人赈济的讨论已经表明,清初对八旗兵丁有灾荒赈济的先例。乾隆初年,关于兵丁要不要赈济也曾曾在朝堂之上有过争论。乾隆二年(1737)直隶水灾中,一些大臣认为,“兵丁领受饷银,其房屋亦系官给,不应在赈恤之内”。乾隆帝表示,兵丁遭灾,房屋坍塌,妻子无依,情殊可悯,应给他们每名赏给银二三两,作为养赡之资<sup>⑦</sup>。乾隆七年(1742)江南大水,对被灾营汛兵丁“各借给饷银一季,俟明年再作四季扣还”<sup>⑧</sup>。乾隆十二年(1747)江苏风潮灾害中虽然赏给被灾兵丁两月钱粮,但上谕中明确指出,“绿旗兵丁因有粮饷,例不抚恤”<sup>⑨</sup>。同年关于直隶灾歉的上谕中也强调,“兵丁例不领赈”,“借给一季饷银”<sup>⑩</sup>。

①《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421页。

②《乾隆朝上谕档》第9册,第55、56页。

③《乾隆朝上谕档》第16册,第822页。

④《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6册,第353-354页。

⑤《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6册,第356-357页。

⑥《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6册,第368页。

⑦《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201页。

⑧《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808页。

⑨《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193、196页。

⑩《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214页。

可见,驻防兵丁例不赈抚的规定是比较明确的。乾隆以降,为了体谅兵丁生计困境,又不违背定制,除个别灾重之地或八旗官兵偶尔赏给一些钱粮外,清廷主要采取预借饷银的办法来救济遭灾兵丁。乾隆七(1742)、十一(1746)、十二(1747)、十六(1751)、二十(1755)、二十七(1762)、三十五(1770)、五十(1785)、五十七(1792)等年及嘉庆十九(1814)、二十一(1816)、二十二(1817)、二十四(1819)、二十五(1820)等年江南、直隶、云南、浙江、湖北、山西等地水、旱、地震灾害都曾以预借饷银的办法救济过兵丁<sup>①</sup>。如果兵丁因灾致穷,以至于不能及时或无力归还借项,朝廷常常给予延缓或蠲免<sup>②</sup>。道光时期,遭灾兵丁借饷救荒的情形更为普遍,几近无年无之<sup>③</sup>。清廷曾效仿灾赈分等定级的办法对驻防兵丁借支饷银进行分等,依据驻防之地灾歉分数的不同,确定各驻防兵丁不同的借饷标准。譬如,道光二年(1822)直隶水灾中,“驻扎灾歉地方各营路及满营驻防兵丁”除坐落成熟州县之营无庸借支外,“将成灾九分、十分驻扎之营分借给一季兵饷;成灾七分、八分驻扎之营分借给半季兵饷;成灾五、六分及歉收三、四分驻扎之营分借给一月兵饷”<sup>④</sup>。另外,清廷也通过调整俸饷中本色、折色的比例和数量来减轻灾荒给兵丁带来的困苦。乾隆十七年(1752)陕西旱灾中,为了抵补粮草价格上涨给驻防兵丁带来的损失,“西安驻防应领折支米豆照原定每石一两之数加给五钱,草价加倍赏给”<sup>⑤</sup>。乾隆三十五年(1770)直隶水灾中,驻防兵丁“折色兵米每石于定例外加价三钱”,以补灾荒损失<sup>⑥</sup>。由于驻防八旗官兵支米“向例俱给折色”,乾隆二十二年(1757)河南水灾时,将“所应支米石给与半年本色,以裕兵食”<sup>⑦</sup>。乾隆二十六年(1761)河南水灾采取同样办法解决驻防官兵的困难<sup>⑧</sup>。

兵丁家属及卫所屯军的灾荒救济却与驻防兵丁有所不同。关于兵丁家属的赈济,乾隆十一年(1746)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称:

向遇地方歉收,贫民例应散赈,惟营兵以有月支粮米,概不予赈。查营兵所支月饷,原不能养赡多口。若因一人入伍食粮,使一家多口不得与灾民均沾惠泽,似属可悯。但一概入赈,又觉过滥。现据各属纷纷稟请,臣思兵丁粮饷一分尚可养赡三四口,请将坐落被灾地方营分,除兵丁本身及家属在三口以内者俱不准入赈外,其多余家口,应各就被灾处所,分别极贫、次贫,编入饥民册内给赈。<sup>⑨</sup>

尹继善的奏折被批准后,兵丁家属三口以外者与州县灾民同被赈济似成定例。乾隆二十一年(1756)江

①《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808、845页,第2册第137、214、560、561、566、600、838页,第4册第104页,第6册第316、332页,第12册第889页,第16册第864页;《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9册第969页,第20册第151页,第21册第267-268页,第22册第94、507页,第23册第85-86页,第24册第314、668页,第25册第273页。

②《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845页、第911页。

③《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360、550页,第27册第685页,第28册第18、326-327、409、435、500页,第29册第117、132-133页,第30册第99、110、145、146页,第31册第81、84、105-106、133页,第32册第7、37、40、95、127页,第33册第97-98、133页,第34册第189、489页,第35册第486页,第36册第57、160、314、365、434、577、568页,第37册第55、112、652、764、771-772页,第38册第19、617页,第39册第466、479页,第40册第444-445、562页,第41册第67、512页,第45册第107页,第47册第20、243页,第48册第25页,第49册第479页,第50册第511页,第53册第411-412页,第54册第47、321、585页,第55册第62-63、169页;《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册第2页。

④《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685页。

⑤《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630页。

⑥《乾隆朝上谕档》第6册,第316页。

⑦《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第130页。

⑧《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第763页。

⑨《清高宗实录》卷281,乾隆十一年十二月。

南水灾的赈济中,将兵属与被灾卫所饥军“各随坐落州县一体加赈”<sup>①</sup>。但乾隆二十三(1758)年二月上谕指出,户部及各省的赈济册籍中,“凡贫生、贫军俱系随坐州县一体给赈,其兵属并未开明给赈字样。惟江苏、安徽二省办赈案内,灾地各营之兵丁家属在三口以内不准入赈外,其余家口仍行赈恤”,“业已办有成案”。乾隆帝令江苏巡抚托恩多申明“兵丁家属在三口以内不准入赈外,其余家口仍行赈恤”的旧例<sup>②</sup>。此后将兵属并入民册赈济也主要发生在江苏、安徽两省,其余各省比较少见。而在许多赈例中,兵属随所在州县卫所贫民、贫生、贫军一体赈济,此处所谓“贫军”系指卫所屯军而言。

遭遇灾荒的卫所屯军,自乾隆初年以至晚清都有明确的救济政策,且随卫所坐落之州县贫民一同被登记在户部及各省的赈济册籍中按例放赈<sup>③</sup>。屯军之所以被列为赈济对象,系由于他们的经济来源是屯田收获所得,并非如驻防兵丁一样有定额的俸米、俸银。清初卫所改制之后,全国各卫所都要承担屯田任务。卫所军户不仅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还要向国家缴纳高于一般民田的额赋。灾荒时期,屯田与民田一样都不能免于灾歉,卫所屯军亦会因为歉收而陷入饥荒。乾隆时期,“普通卫所已被裁减殆尽”,各有漕省份的卫所由于有转漕任务而保留得比较完整<sup>④</sup>。因此,乾隆以降关于卫所军户灾荒赈济的记载主要在有漕省份,尤其是江苏、安徽、浙江等省<sup>⑤</sup>。

## 五、边疆民族地区灾民

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其组织管理上的二元性,灾荒赈济也有自身特点,蒙古地区和土司辖区最为典型。

蒙古与满清皇族之间的盟友和姻亲关系使得该地区灾民得到了很大优待,作为皇族外家的科尔沁地区更是倍受关注。雍正元年(1723),东蒙地区发生饥荒,雍正帝特别强调,“科尔沁一旗与别部落蒙古不同”,既是“太祖高皇帝时首先臣服”的部族,又作为其“皇曾祖妣孝庄文皇后、皇祖妣孝惠章皇后之母家”,世为“国戚”百余年,特发地方仓米2万石、户部库银3万两予以赈济<sup>⑥</sup>。科尔沁蒙古的特殊地位也带动了清帝对整个东蒙地区灾荒问题的关注,清廷专派中央大员携带户部库银5万两前往喀喇沁等旗救荒<sup>⑦</sup>。此外,大部分蒙古地区由于地方管理上有盟旗制和厅县制两个系统,灾荒赈济也出现了两类不同机制。盟旗制下的蒙古地区发生灾荒后,首先由蒙古王公自行赈济。灾情严重时才通过理藩院向中央申请拨款、拨粮。中央政府从邻近蒙古地区的陕、甘、晋、直等省调拨钱粮“借”给蒙古王公,由他们赈济辖下灾民。事后,所借钱粮从蒙古王公的俸银中折扣。这一点在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中有明文规

①《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第1页。

②《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第160页。

③《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第160页。

④李巨澜:《清代卫所职能略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06期。

⑤《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211、503、824页,第3册第1、160页,第7册第777页,第16册第106页;《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册第209页,第5册第165页,第12册第467页,第17册第420页,第19册第787页;第22册第396-397、433页,第23册第448页,第24册第4、613-614页,第25册第469、471页,第26册第9、455-456页,第27册第1-2、553-554页,第28册第10-12页,第29册第1-3页,第37册第4、607-608页,第38册第2、499-501、616页,第39册第5页,第45册第1页,第46册第3、5、324-326、329页,第47册第9、414-415页,第48册第1、529-531、571-573页,第52册第1、4页,第53册第7、366-367、373-375页,第54册第3、4、464-467、469-471、507-509页;《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册第2、513-514页,第2册第7、444-446页,第3册第2页,第4册第386-388页,第5册第481页。

⑥《清世宗实录》卷8,雍正元年六月乙卯。

⑦《清世宗实录》卷10,雍正元年八月己巳。

定,“各部落偶遇岁荒,扎萨克设法养贍。不足,告盟长协济。再不足,会报到院,奏请发帑,并预支王以下次年俸金,以济其乏”<sup>①</sup>。晚清时期,这种赈济办法仍然在沿用。光绪九年(1883),蒙古喀喇沁公旗呈报连年遭灾,请将“塔子沟税银内应给二成半银支借赈济”。理藩院依照道光年间成案,“请旨借给十年应得税银,按年扣还”<sup>②</sup>。盟旗制下的救荒机制中体现了两类关系的结合:一是清朝政府与蒙古王公之间的有偿借贷关系,一是蒙古王公与辖下灾民的无偿赈济关系。厅县制下蒙古地区发生灾荒时,救荒机制与内地州县辖区例同,由厅县官奏请筹拨赈济,所用钱粮并不由地方官俸银扣还,而是归于政府正项开销。另有内地流民租种蒙古旗地者,由于“无须完纳国课”,“向来遇有偏灾,从未办理赈恤”。道光十二年(1832)直隶多伦诺尔厅全境失收,直督奏请赈恤一例“实属创始”。清廷“逾格施恩”,准许将“极贫之户每大口日给银三分,小口减半,每户大小不得过五口”<sup>③</sup>。

土司地区由于土民并不向清朝政府交纳赋税,按例不予赈济。遇到灾荒十分严重而奏请援助时,中央政府也如对待盟旗制下蒙古一样,借给土官钱粮,由其赈济辖下土民。所借钱粮由土官分年归还。灾荒发生后,若地方督抚代土官奏请赈济,多会得到皇帝的允准。然也不免要强调,土司地区按例不在赈济之列,所赏赈银皆系格外恩惠。乾隆十二年(1747),四川土司地区霜灾,奏明每户给赈银5钱;乾隆二十三年(1758),四川里塘土司遭遇瘟疫,虽然“土司所属原无议赈定例”,但鉴于“里塘为进藏要路,该番民节年供应差使”,每户赏给银3钱<sup>④</sup>。土司与清政府在灾民赈济方面虽然践行的是一种借贷关系,但清帝为笼络边疆官民的向背之心,往往会将赈灾钱粮免于归还。乾隆二十四年(1759)甘肃旱灾中,就曾谕令将庄浪土司辖区土民所借银米赏给<sup>⑤</sup>。这一点也深刻体现在嘉庆二年(1797)关于甘肃平番县连城土司辖区灾荒救济中。嘉庆元年(1796),连城土司辖区夏季被旱,秋禾又歉收,土司自行安抚。至次年青黄不接时,地方官代土司奏请,“因土民向不输纳正赋,例无赈恤”,“请援照成例,借领籽种、口粮”。嘉庆帝念及“该土司等远处边徼,生计维艰”,将此次所有借领籽种、口粮应当由土司折银归还之项“照数赏给”,“免其分年扣还”<sup>⑥</sup>。此一事例中,官员对纳税义务与获赈权利关系的强调,使得嘉庆帝对这些地区“免其归还”的格外体恤显得更为“仁爱”,这种“怀柔”策略也就更见实效。而嘉庆帝对边疆民族地区民心浮动、边乱骤起根源的思考也进一步表明,清廷在灾荒时期接济边疆民族地区若干钱粮的行为对于稳定边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有清一代内外关系分明,清廷对这些地区和民众的灾荒赈济一直没有突破“格外恩赐”的政治外衣,也一直发挥着“怀柔”边民的重要作用,其背后也隐含了一些地缘政治层面的思考。这一点在嘉庆时期一次讨论中表露得极为鲜明。嘉庆六年(1801),西宁办事大臣台布就蒙古与番部之于内地的关系提出“蒙古强实为中国之患,蒙古弱乃为中国之福,以番制蒙诚为良策”的论调。嘉庆帝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甚属错谬”。他进一步指出:

我朝开国以来,蒙古隶我臣仆,重以婚姻,联为一体。青海地方蒙古虽非内外扎萨克可比,亦不应稍有歧视。雍正年间,于该处设立办事大臣,本为保护蒙古起见,诚以番族襟居蒙古之外,而蒙古实为中国屏藩。是以蒙制番则可,以番制蒙则属倒置矣。<sup>⑦</sup>

① [清]允禔等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卷79, [清]纪昀:《钦定四库全书》第619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第739页。嘉庆十六年(1811)阿拉善地区蒙古部荒歉、嘉庆十八年(1813)土尔扈特蒙古部灾荒都照此例办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6册, 第624页; 第18册, 第161页)。

②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9册, 第201页。

③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8册, 第92、93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562,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乙酉。

⑤ 《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 第352页。

⑥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册, 第92-93页。

⑦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6册, 第404-405页。

这就无怪乎有清一代对蒙古地区灾荒进行了频繁赈济<sup>①</sup>,对于“番族”,尤其是土司等特殊地区则甚少直接赈济,而且时时强调系“格外施恩”。但当“番族”聚居区同时出现边患与灾荒时,清朝对其救荒问题就更为关注,目的也在于怀柔其心以消弭边患。甘肃宕昌“番民”“向来并不纳粮,原与内地民人有间”。嘉庆初年,该地连年“被贼滋扰”,嘉庆六年(1801)更遭重灾。清廷“将宕昌番民照该处汉民成灾分数一体给赈”,并令陕甘总督长麟传谕这些“番民”,因“尔等素知安分守法,是以偶值灾歉,即加恩赈恤”<sup>②</sup>。另有如新疆地区,回民因有租种屯田者,亦有自种之地,清廷的救荒态度也有差异。乾隆十三年(1748),哈密回屯地亩因缺雨旱歉,当地回民自种田亩亦均被旱伤。清廷将回屯被旱地亩“原借籽种粮石着缓至来岁秋后征收”,而“回民自种地亩,向无因灾议抚之例”。但考虑到哈密地处边徼,灾民口食无资,即“于哈密仓贮粮内赏借口粮糜麦二千五百石,交贝子玉素富择回民中乏食者分散借给,以资秋冬糊口”<sup>③</sup>。

姻亲关系、经济权利、行政建制、政治心态等诸多因素使得清廷在对待边疆民族地区灾民的态度上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蒙古与其他民族地区相比,与清代有着姻亲、盟友乃至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和地位,其灾荒也较多地受到清廷的关注。蒙古王公、土司等辖区民众因不向政府直接缴纳赋税,原则上其灾荒救济亦不由政府直接负责,而是由地方首领自行赈济。这与府厅州县流官制下官员赈济灾民不同。流官是政府的代表,是皇权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并不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亦没有绝对的救荒任务。他们只是代皇帝行使惠民之权,其赈灾所费自然由朝廷乃至皇家内库来支付。

## 余 论

清代官方的灾民认定规则和救济策略是随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融合的步伐逐渐成熟起来的。清初,由于满洲特色尚显浓厚、社会经济亟待恢复、荒政体制尚未完善,被纳入国家赈济范围的灾民群体有限,主要是旗人和农户。雍、乾以后,尤其乾隆朝,降低了“灾民”的准入门槛,扩展了“灾民”的认定范围,将不同身份、不同境遇的灾民群体纳入国家荒政体系之内。在此过程中,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民族、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多元性催生出的姻亲关系、族群认同、经济权利、阶层分异、文化区隔、地缘政治、灾荒境况等诸多因素对清代国家认定灾民身份和确定救济策略产生了不同影响,使得不同群体中“灾民”的救济待遇表现出鲜明的差异化特征。但为了实现“毋任一夫失所”的“养民”宏愿,清廷一方面继承前代养民、养士、养兵的政治传统,并结合本朝政权特点,在优先旗人的前提下,对支撑国家建设的农户、士人、军户等主流社会阶层给予充分的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对不同经济状况、社会阶层的城乡居民和不同行政建制、地缘政治下的边疆民族地区灾民也给予了相应救助。同时,还对以下特殊灾民群体和灾荒地亩进行了特别处理:(一)盐场灶户,雍正以降在盐运司下捐设盐义仓专门解决其粮食问题<sup>④</sup>,对云南等井盐地区灶户也时常给予救济<sup>⑤</sup>。(二)海外遭风难民,康熙、雍正时期都曾进行抚恤<sup>⑥</sup>,乾隆之后则形成抚恤定例<sup>⑦</sup>,以表“怀柔远人”之意。(三)漕船帮丁,因灾荒歇业之后其月粮例定减半发放,粮价

① 包庆德:《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3-227页。

②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6册,第378页。

③ 《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226页。

④ 张岩:《清代盐义仓》,《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3期。

⑤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24页;第29册,第454页。

⑥ 《清圣祖实录》卷201,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丙寅;卷209,康熙四十一年九月戊午;卷279,康熙五十七年五月辛未。  
《清世宗实录》卷82,雍正七年六月庚子;卷85,雍正七年八月丁未。

⑦ 《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222页。

飞涨时不免陷入糊口维艰境地,清廷通常会加赏若干成数,使其度过荒年<sup>①</sup>。(四)手艺人,因有“手艺营生,或佣工度日”,不在应赈之列<sup>②</sup>,清廷也曾通过借拨仓粮减价平糶的方式予以接济<sup>③</sup>。(五)减则地亩,因已减缓田赋,定例不准报灾。嘉道时期,积歉日多,“准其照邻田”勘灾定赈,并将减则之后应完钱粮“一律准其缓征”<sup>④</sup>。(六)灾区邻地,因堪不成灾而例不赈恤。但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上谕中所指出的,未被灾“乡庄究与灾地相离不远”,“有无相通,自所必有”,“嗣后各直省遇有灾赈事务,将成灾五分以上州县之成熟乡庄,俱着照例一体缓征,俾得通融周济”<sup>⑤</sup>。为了在不违背既定规则的前提下对真正的“灾民”给予充分救济,清廷在救荒实践中一面严格采用多种因素交互确认的方式,一面则灵活调整救济策略,从而使身份各异、境遇不同的各类灾民大都有了规则明确而形式多元的获救路径,这对清朝“大一统”国家政权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李良木)

### [参 考 文 献]

- [1] 张建民. 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6, (1).
- [2] 袁昌曲. 明清时期生员赈济原因之探析[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5).
- [3] 张祥稳, 刘亚中. 乾隆朝灾赈对象之条规考辨[J]. 中国农史, 2012, (4).
- [4] 王洪兵, 张松梅. 清代京师的粥厂与贫民救助[J]. 东岳论丛, 2013, (5).
- [5] 清高宗敕撰. 清朝通典[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 [6] 清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7] 托津等奉敕撰. 钦定大清会典[M] // 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90.
-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乾隆朝上谕档[M]. 北京:档案出版社, 1991.
-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12] 李文海, 夏明方, 朱浒. 中国荒政书集成[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 [13] 包庆德. 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①《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815页。

②《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888页。

③《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6册,第565-566页。

④《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1册,第744页;第12册,第486页;第13册,第580页;第16册,第606页;第17册,第366页;第20册,第497-498页;第22册,第396-397页;第25册,第469页;第26册,第455-456页;第27册,第553-554页;第53册,第373-375页;第54册,第507-509页。

⑤《乾隆朝上谕档》第11册,第458页。